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Economics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Second Edition)

收入再分配的 经济学 (第二版)

Gordon Tullock

[美] 戈登·图洛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范飞 刘琨——译 陆铭——校

现代政治经济学

前·沿·译·丛

Economics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Second Edition)



收入再分配的 (第二版) 经济学

Gordon
Tullock

[美] 戈登·图洛克——著

范飞 刘琨——译 陆铭——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美)戈登·图洛克
(Gordon Tullock)著;范飞,刘琨译.—2版.—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现代政治经济学前沿译丛)

书名原文:Economics of Income Redistribution
(Second Edition)

ISBN 978-7-208-14561-0

I. ①收… II. ①戈… ②范… ③刘… III. ①收入分
配-研究 IV. ①F0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257 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封扉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第二版)

[美]戈登·图洛克 著

范飞 刘琨 译

陆铭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75 插页 4 字数 194,000

2017 年 7 月第 2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61-0/F·2457

定价 48.00 元

再版前言

12年前,我写了一本关于收入再分配的书。我自认为它与那时的实际情况还是相当符合的。而在第二次印刷并售出了很多之后,出版商建议我重新出一本修订本。当时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几年又过去了。与12年前相比,当今世界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全世界,养老金体系和医疗制度都处在一种危机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新的政治动向似乎正在形成当中。它偏离了我在写本书第一版时多少算是正统的那种收入再分配方式。当然,这本书的第一版没能预测到未来的这些变化,没有提出一种新的体制,也没有反对这些主张。所以,有些论题虽然在当时是切合实际的,但是却不适合当前的状况了。

本书所做的任何改变都是为了能够更加符合当前的实际。各种描述性或者是分析性文字发生的变化并非出于我的某种政治目的,而是由于我相信一个经济学家的职责就是分析事实并给出相应的建议。这样,选民(或者某些时候是独裁者)就可以采取行动以尽可能地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跟许多南美国家一样,墨西哥的养老金系统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当我访问墨西哥时,一些经济学家跟我讨论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我的回答是,要么增税,要么减少养老金的支付。这显然不是他们愿意

听到的答案。无论如何,我坚持我的回答。它是一个由分析得来的正确答案。

本书与第一版有着相似的框架结构。首先讨论我们现有的收入再分配体系,然后给出经济学的分析。一般来说,我不会给出消除这些方案的灵丹妙药。因为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就是使得选择变得更加明确,并为人们提供信息,帮助他们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做出选择。而我自己偏好哪个福利状态则是无关紧要的。

在本书第一版中,我曾试图区分各种偏好。对此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批评我“作了些毫不相干的对比”,不应该把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与美国这类国家里的贫困现象相比较。

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一项计划声称说要消除贫困,但是却又只给第三世界国家很少的钱,那么这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愿意,我们当然可以完全忽略第三世界的穷人,但是如果真这样,那么我们就不应当说自己是多么热切地期望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帮助穷人中最最贫困的人。

敲响收入再分配的警钟

——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序

陆 铭^{*}

有两种关于收入分配的无知：一种是，认为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事，不需要特别在意；另一种是，认为出于良好愿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总是有益的。在中国，当前一类无知逐渐被抛弃的时候，对后一种无知保持清醒的认识尤其重要。这时，图洛克教授的《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出版，可谓及时。

人类社会天然就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的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收入不平等。在当今世界，面对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府官员们纷纷给出各种解释和政策，而关于这些解释和政策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教育水平、不同的能力和责任不同的工作岗位，收入自然不同。当收入不平等是由这些因素导致的时候，通常不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因为贫富差距的形成过程本身似乎是“公正”的。但是，另一类形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却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比如说，有些人通过他的社会关系获得了别人得不到的资源，或者有人拥有某种政治特权，或者有些人处在垄断部门……

^{*}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总之,如果说收入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市场竞争,那么,这类收入不平等就是比较接近于公正的。而如果不平等更多地来源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那么,不平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公正。当然,公正和不公正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如果一个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而收入更高,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良好的教育是因为他父亲花钱贿赂了教育部门的官员,或者是因为他比一般人更能利用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那么,更高的收入当中,就有一部分仍然会被人质疑其公正性。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如果出现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结合,那么,市场经济和收入分配的公正性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技术进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得人类社会出现了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y change),其结果是,在制造业里的大量常规岗位被数字化的机器所替代。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岗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他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办公室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国家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全球化带来了资本和商品的更为自由的流动,劳动力虽然难以流动,但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卖到发达国家的时候,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只得关门。与此同时,全球化真正使得资本的幽灵在世界的上空游荡,在资本家拿着巨款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就业,半推半就地打开了国门。在全世界无产者还没有联合起来的时候,如果偏离本国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而过多地为劳动者争取利益,善良的愿望就会筑就通往地狱之门。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劳动者弱势的局面得以形成,劳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

中国在 1978 年明白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尽管 30 年前还没有“知识经济”和“全球化”这样的词汇,但“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代已经

到来,中国不得不放弃关起门来图发展的旧梦,主动将自己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影响全球的事件:中国有几亿的农民进了城,其中一部分至今仍然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同时,市场机制取代行政力量,成为决定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主导力量,也使中国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得以凸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地扩大。在发展至上的政策导向下,大量的经济资源向城市集中,而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却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未能充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都向更接近国际市场的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在人与人之间,教育的回报终于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企业的管理者得到了更多的物质激励,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施展才能的机会……人际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整个80年代,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各种背景的人们都纷纷抓住市场的机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流动性也非常高,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随着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人们日益感觉到,除了国际上的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两大趋势,以及中国自身的市场化趋势之外,一些“不公正”的力量正在悄悄地嵌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关系似乎越来越重要,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现象广泛存在,如果私人领域的社会关系和公共领域的行政权力结合在一起,腐败便得以孳生。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大踏步前进。一方面,传统的国有和集体部门有大量的劳动力被推向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进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劳动保障欠缺的背景下进行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对发挥中国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功不可没,但是,这场竞争却基本上没有对国有垄断部门产生影响。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在90年代中期之后呈快速上升趋势,而且在形成总体收入差距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今天的中国,要提高收入,就需要有高教育,要有关系。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相结合的现象正在出

现,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收入流动性下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这话对了一大半。由于中国的改革起点是一个教育回报受到抑制的计划经济,再加上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保持了社会中原有的权力结构,这样的市场化进程的确难以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不需要政策关注的问题。政府是一个提供公共品的机构,而人类社会一直需要这样一个公共品,那就是“平等”。人类对于平等的需要既是因为人有将“公正”作为基本价值的需要,也是因为不平等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之大。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贫困治理、促进健康、增进信任、改善环境等均有负面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并不只是为了“公正”本身,也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恰恰是因为收入的适度均等有利于持续发展这样一个公众目标,使得“平等”本身成了社会需要的公共品,而它却是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品。有了这些认识,经济学家就可以告诉人们,收入的适度均等化不应该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特别是当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公正”不能达成一致时,出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追求适度的收入均等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经过 30 年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在当代中国,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还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内外“双重失衡”。从内部来看,收入的不均等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因此,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在 1994 年之后)更多是由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拉动的。在国内,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于是,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常常采取加大政府投资的手段,但这在宏观上造成了供给相对需求的过快增长,又使得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却出现了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现象。而企业层面则过于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缺乏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了过于依赖低成本的困境。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走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

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扩大,给人民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加重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宏观风险日渐积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宏观困局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由外汇储备高企引发的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除了与人民币币值低估有关外,也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产品价格过低有关。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在2004年前的10多年时间里,民工工资几乎没有上升过,这与民工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缺乏有关。而1996年之后,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又对劳动成本产生了向下的压力。这些条件使得中国迅速成为新的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和外汇储备猛增。于是,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又进一步地引发了“外部失衡”。

适度地缩小收入差距成为当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关键所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反对任何认为收入不均等无需成为政策目标的无知,我更反对认为经济学家只关心效率,不关心不平问题的误解。然而,正当我们把适度的收入均等作为一个目标交给政府的时候,我们却可能面临着一种新的悖论,甚至是危险,那就是,政府有可能在收入均等的政治口号下,为特权的存在提供借口,最后,政府的政策是扩大了差距,还是缩小了差距,成为一个未知数。正当经济学家们努力揭示出收入过度不均等所可能导致的社会经济后果,以促成合理控制收入差距的社会共识的时候,图洛克教授在《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一书中对政府再分配政策的怀疑不失为振聋发聩的一记警钟。

图洛克教授的一个基本担心是收入再分配可能过度。他试图说明,在一个投票机制下,贪婪(想有更多收入)和有忌妒心(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低)的人可以迫使那些贪婪并且慈善(希望某些其他人收入更高)的人们支付更多的收入转移支付。相比之下,如果慈善的人可以做出个人选择的话,他们将支付得更少些。这种担心从精神上继承了公共选择学派对于政治过程是否可能实现社会最优的怀疑。图洛克还认为,政策制定者(包括经济学家)有时可能会成为好事者,会怀疑人们

判断自己的效用的能力,从而为包括再分配政策在内的政府政策提供一个理由。不巧的是,有时,我也认为,人的短视行为,或者人对于社群内部其他人的行为的模仿,都可能使个人的选择偏离社会最优的状态。政策的干预在理论上是有可能改善社会的福利状态的,但是在现实中,政府是否能够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我看来,与阐述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背景和意义相比,任何对于此书内容的过多的解释都可能是不明智的。在这本书里,图洛克教授肯定没有形成有关收入分配政策的完整的看法,但是,在时下中国政府雄心勃勃地要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时候,对于像我一样对收入平等怀有期许的人来说,如图洛克教授那般对政策的形成机制及其有效性保持些许的怀疑,恐怕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实施某个新的政策得以解决,否则,可能使社会陷于问题越来越多和政府管得也越来越多的恶性循环。

戈登·图洛克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他出生于1922年,在2001年的一份长达57页的简历里,我们可以在第一页读到,他未婚,曾经在1949—1952年期间分别在耶鲁和康奈尔大学学习中文,他最近的一个教授职位是在乔治·梅森大学的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之后的一页是他的荣誉和职业经历,再之后,是他的著述目录,长达55页。他最为重要的合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他们共同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引入了政治行为和政治决策的研究。

图洛克教授的同事,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罗杰·D. 康格尔顿(Roger D. Congleton)在一篇总结图洛克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的文章中说:“公正地说,很少有公共选择学者能够像戈登·图洛克那样对于公共选择研究的许多领域贡献得如此之多,并且如此深入。图洛克教授的工作不仅考虑了良好的法律秩序内部的政治和契约关系,而且涉及了寻租社会内部、企业内部、法庭上、交战中的社群内部、酝酿革命的行为当中以及产生于无政府状态或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行为等等那些不寻常的政治行为。他的成果是非同寻常的完整的政

治经济学,包括了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独裁、民主和法庭内部,以及科学本身内部的决策行为。同样可以公正地说,戈登·图洛克教授使用了相对简单的工具来分析这些深远的课题……使得图洛克的工作区别于其他使用理性选择方法的社会科学家的是,尽管他使用了简化的工具,但他的工作在本质上却倾向于反对简化主义,而不是简化主义。许多图洛克的工作都使用简化的模型去证明了,与之前人们所认为的状况相比,世界显得更为复杂……在图洛克的脑海里,决定一项特定研究的价值的是思想和分析的原创性,而不是用来传递思想的文字和数学模型的质量。”

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一方面有成为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的倾向,一方面又有沦为快餐化的政策咨询和形势分析的趋势。工具取代了思想,热闹赶走了冷静。这时,一本并不算太新的著作的中文版得以问世,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而这样的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若干年再读它,仍然觉得它在说当代的事,并且继续在引起新的争论。

2008年6月29日

定稿于上海家中

目 录

1 再版前言

1 敲响收入再分配的警钟

——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中译本序

1 第一章 再分配的理由

22 第二章 横向转移支付

41 第三章 信息与互投赞成票

60 第四章 慈善捐赠

87 第五章 混合情形

115 第六章 广泛的福利还是穷人的福利

131 第七章 福利与养老金

151 第八章 医疗补助

164 第九章 失业保险

172 第十章 教育与慈善

185 第十一章 行政性转移支付

205 第十二章 怎么办,怎么办

第一章 再分配的理由

许多人认为,再分配就是劫富济贫。毫无疑问,这种行为总是在发生,无论是在现代政府,还是在历史上的各个政府中。但是在现代,对穷人的救济只是政府所有转移支付行为中冰山之一角。大多数转移支付不是给了穷人而是那些有良好政治组织的群体。当然,对穷人提供帮助仍是现代社会各国政府的目标之一。“再分配”这个词也包含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把“再分配”扩展到指政府把资金或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所有现象,那么再分配就比普通的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含义要广阔多了。

在现代,再分配可能是大多数政府最重要的一项职能了。当然它也是政府的传统职能之一。所有有记载的政府都或多或少担负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实际上,就像后面讨论的那样,政府成立的最初动机极有可能就是为了进行某种再分配。

尽管再分配在政府各项行为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但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却少之又少。人们收集了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统计数据,并对如何改变分配方式提出了不同的建议。他们也对收入再分配的效率结果进行了研究。然而,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对这个领域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受一种观念的影响,即再分配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而不是科学要研究的问题。人们赞成或者反对某种收入再分配方案基本上也是出于道德的考虑。他们认为科学和道德是不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大多数人还认为科学应该为道德服务,这种观念使得他们不重视建立在收入再分配方案基础之上的科学研究。既然再分配方案是否合乎道德的要求取决于人们用哪种道德标准来衡

量,那么人们就有了足够的动机去赞成或者反对某些方案,而不再进一步研究方案本身了。

也许正是这种对道德的重视,使得大多数关于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讨论都集中于一点,而这一点只是所有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中的很少一部分。当然,大部分现代国家为了实现再分配的传统道德目标,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穷人。然而,毫无疑问这也仅仅只占政府整个收入再分配方案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在 1993 年的那一财政年度,美国花了很大一笔资金用于官方所谓的转移支付。这笔资金足够向处于社会底层的 10% 的人口每人支付大约 40 000 美元,或者是向处于社会底层的 20% 的人口每人支付大约 20 000 美元。这意味着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一个四口之家分别能拿到 144 000 美元和 72 000 美元。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事实上,即使这两种类型的群体没有其他任何收入,仅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就能处于美国的平均收入水平之上了。

在美国,穷人到底得到了些什么,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再分配方案,使得那些穷人有时候符合接受救济金的要求,有时候又不符合条件。美国没有一个针对所有人的普遍的收入保障方案,但对于不同的人却有许多不同类型的方案。在美国一个富裕的州,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带着三个没成家的孩子居住在受补贴的住房里,他们这种状况甚至还没有接近前面所说的那些数字,但他们的经济条件也不是特别困难。

一个失业的成年男子,健康状况良好,但他的失业保险金已经用完了,这可能使他再也得不到任何救济了。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其中有许多人长期吸毒,嗜酒如命,或者是精神状况不稳定,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应属于上述的第二种类型群体。然而,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却不能直接从政府那里领到救济金,因为他们不属于政府发放救济金中的任何一类群体。

我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没有一个普遍的收入保障方案,虽然会在许

多方面有不利之处,但这样却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在欧洲,失业保险金额更大,保险的时间更长,大量的人可以依靠失业保险金生活,从而没有任何想找工作的意向。但是在美国,失业保险金额较小,很快就耗尽,这个事实意味着美国有较低的失业率。

读者有可能会问,余下的再分配资金去向如何,这本书的后面部分会关注这个问题。实质上,现代政府有个习惯,就是向老年人这种功能性群体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尽管他们并不贫穷。这个习惯从俾斯麦宰相开始就有了。我自己并不贫穷,却从那些再分配方案中得到了许多转移支付。我还是宁愿他们只救济穷人,包括那些年老的穷人在内。

除了这些常规的转移支付之外,政府在许多方案中还会采取激进的转移措施,把财富从社会的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个部分。美国的工会组织竭力阻止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会使资金从本国的劳动者手中转移走。这种想法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即使一定量的资金会转移到墨西哥人手中,转移的数额却并不大。然而,由于墨西哥对外贸易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有所上升;同样,美国的生活水平也因此而上升。鉴于墨西哥人比美国人贫穷得多,如果工会组织真正对收入的平均分配感兴趣的话,他们无疑会对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表示赞同。

更进一步地说,大部分政府支出给予人们的好处与他们所支付的税收不成比例。就拿公共教育来说,一项主要由地方政府出资的庞大计划,其受益人几乎就是那些纳税人,但又决不一一等同。另外,虽然穷人能像其他人一样,免费接受初等教育,但他们决不是主要受益者。

我不希望引起人们的误解。在美国,穷人的确得到了大量的救济金,^[1]但比起整个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说还相差甚远。大部分转移支付还是给了那些政治上组织良好、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事实上,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历史上,政府进行收入转移的主要动机都很简单,也就是受益者们想要拿到这些钱,而且他们能够凭借自己政治上的权力,有的时候凭借的是运气,来实现这个愿望。的确,在

一个民主社会里,即使穷人有选举权,他们也明显不可能从自己的选票中得到回报。

在学术上,有一个关于转移支付的普遍的困惑。著名学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对此进行了很好地阐释。他说:“政策问题应首先考虑以补偿的方式帮助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2]

大多数人对政策问题的兴趣,可能常局限于与自己相关的某些方面,从而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事情。他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去考虑不切实际的道德观念。在一些数量有限的问题上,他们可能有着强烈的道德观念,因为这些问题的结果并不是实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对于一些被称之为“生计”的问题,他们却接受这样一个道德标准:在政治上,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同时期望别人也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尽管学术界中的很多人试图严肃地,而不是仅以个人立场,来对待分配问题。学生抗议学校收取高额学费,他们很不愿意承认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省钱。他们抗议,是为了维护那些更穷的人的利益。再则,教授维护自己的薪水,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玩道德游戏。但是,种烟草的农民关心自己家庭的福利状况,却不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3]

谢林的这篇文章有很大篇幅都是在讨论,通过经济政策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这种方式是否能够帮助穷人。当然,谢林很清楚地知道,政府的大多数政策没有涉及帮助不幸的人和弱势群体,但这些政策却维护大学教授、学生以及种烟草的农民等人的利益。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种近似精神分裂式的收入分配方式充斥着文献。

于是,收入转移的动机更加复杂化了,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帮助穷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人都富有爱心,他们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去帮助那些境况比他们差得多的人。^[4]更有甚者,许多人不仅会向穷